

張自忠上將生平紀實

張慶宜*

張上將自忠，字蓋忱，山東省臨清縣人，清光緒17（辛卯）年7月7日寅時（1891年8月11日寅時）出生於臨清縣唐園村，民國29（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省宜城縣殉國，享年49歲，時任陸軍第三十三集團軍上將銜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

將軍性純孝，祖父春林為一鄉望。父樹桂苦讀成名，光緒27（1901）年任江蘇省贛榆縣青口巡檢，以勤廉清正著稱，光緒29（1903）年調升為贛榆縣令，1906年因積勞卒於任所。育五男三女，將軍排行第五，妻李敏慧，育二男一女，家族人丁興旺，今五代孫支茂盛。

父親故去後，將軍隨母親馮氏扶柩返鄉，就讀於臨清高等小學堂（即民國時臨清縣立中學堂），宣統2（1910）年畢業，隨即考入「天津法政專門學校」，1911年在校加入同盟會，1912年轉學到濟南，就讀於由山東同盟會負責人丁惟汾任校長的「山東省法政專門學校」。袁世凱派人入魯捕殺同盟會員，

丁校長返鄉避難，將軍沒有畢業，就於1914年秋赴新民屯，投效陸軍第二十鎮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團車震部，補為副兵，這年他23歲。

臨清同鄉車震是將軍的第一位長官，他這時正在八十七團任團長。1915年，車震升了師長，調駐湖南，將軍在師部任參謀。1916年車震去職返鄉，將軍隨車回到北方，車震薦將軍到天津鎮守使趙玉珂處服務，留三月，見部隊中積習甚深，官兵日以敷衍，乃乞假歸里。1917年秋，車震送將軍至廊房，面薦於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旅長，直到1930年。馮玉祥是將軍一生中追隨時間最久的長官。

將軍初到第十六混成旅，當了短時間的「中尉差遣」，就被派到部隊中當排長，上級是石友三。

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駐常德，將軍在旅部任上尉副官，4月，調任「水上陸戰隊」第三隊隊長，負責訓練新兵的工作。將軍練兵的方法深得馮玉祥的賞識，正值十六混成旅招募了一個新

* 張自忠將軍長孫

兵團，其中有126名是曾上過學、識字的兵，集中編成一個學兵連。9月，將軍任第四團第二營的第五連（學兵連）連長，他的營長是佟麟閣，團長是張維璽，後來都是二十九軍的同僚。10月，十六混成旅駐河南信陽，12月，學兵連擴充為學兵大隊，轄一、二兩連，分由馮治安和將軍任連長，其後兩人又同時擔任二十九軍的師長，不同的是，當年馮治安為學兵大隊長兼第一連連長，將軍任第二連連長，歸馮管轄。而在二十九軍中將軍是三位決策人中的第二位，位於馮治安之上，二人這樣的手足友情維持終生。

1921年，十六混成旅擴編為第十一師，馮玉祥升任師長兼陝西督軍。他把學兵大隊編為督軍署的學兵營，升將軍為該營營長。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4月，馮玉祥奉命進攻河南，趕走了河南督軍趙倜，於是馮玉祥再次擴充兵力。5月在開封招募了5個新兵團，附帶招了一千多名學生，成立了一個學兵團，他自己兼任團長，令石敬亭為副團長兼教育長。該團只設一個訓練營，下轄8個學兵連，將軍被派任為營長；後來又招收不少學兵，將軍兼任了學兵團團副。10月，馮玉祥任陸軍檢閱使，將軍隨部調

駐北平南苑，此時的學兵團，實際是一所軍校。

1924年直奉戰起，秋，將軍奉命向熱河出發，經北苑、高麗營、懷柔、密雲、古北口，至灤平。大雨二十餘日無法行進，駐在灤平，將軍升任學兵團團長，後奉命於10月23日回到北京，馮玉祥部改為國民軍第一軍。

到1925年，奉命將受訓期滿的學兵分發到各部隊，充當西北軍的基層幹部。4月，將軍調至張家口任西北軍邊防督辦公署衛隊旅學兵團團長，該團未曾招兵，將軍結束了他在西北軍中培訓軍事幹部的工作。

綜觀將軍在西北軍中的十三年，他做成了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為西北軍培訓了三千多名初級軍官，其中升任為中級軍官者無法計數，升任為高級軍官有數十位，這些英才在抗日戰爭中，為保衛中華民族做出過重大的貢獻，其中不少英雄為國盡忠。

9月，將軍升任第五師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師長石敬亭，將軍自己去河南招了新兵，帶回到張家口，隨即奉令移駐包頭附近之西腦包。

1926年1月，將軍奉令移駐內蒙豐鎮，時逢大雪，全列車僅為旅長配一節

保溫的篷車，將軍令全旅傷病員使用篷車，自己和全旅官兵同乘敞車開赴豐鎮，這個舉動得到士兵的崇敬。這一年馮玉祥遭到直、奉兩系軍隊的聯合攻擊，馮宣布下野去蘇聯考察，西北軍中無人能支持住這個局面，南口也終於陷落，全軍向綏西退卻，此時第五師歸宋哲元指揮，在山西和晉軍作戰，突然宋哲元被調往包頭一線作戰，而十五混成旅交給石友三任師長的第六師指揮。不久將軍得悉，石友三失守馬邑（今朔縣），但石卻向上級誣報：「張自忠抗拒命令，擁兵不救，致使馬邑失守。」按西北軍慣例，這是一條軍法從事的大罪，是石友三有意對他的陷害。將軍為了躲過此禍，隻身逃到晉軍將領商震處躲避，將軍和商震是在奉天省新民屯陸軍第二十鎮的同事。這是將軍一生中受到的第一次陷害，是一生中蒙受的第一段不公平、不得意的日子。

將軍拒絕了閻錫山的招納，自此韜光養晦，等待時機。

1927年4月，武漢國民政府任命馮玉祥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他查清了馬邑事件的本末，即派張樹聲拿了他的親筆信，召將軍立即歸隊。將軍來謁，馮玉祥即委任他為第二集團軍運輸副司令之職，幾天後調任第二集團

軍總司令部副官長。這時是1927年的8月，此時帶兵降晉的石友三又回到西北軍中，托蕭振瀛向將軍遞上金蘭帖。將軍旋兼任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12月，將軍升任二十八師師長。

1928年初西北軍縮編，二十八師改編為二十五師。

1929年全國陸軍舉行軍風紀考察，二十五師列全國陸軍第一。5月，將軍移駐陝西潼關，兼潼關警備司令，未幾任第十一軍副軍長兼二十六師師長，駐西安，12月任暫編第六師師長。

1930年2月，將軍率暫編第六師赴天水，兼任天水鎮守使；4月，奉命由天水南調參加中原大戰。

二

暫編第六師由天水長途跋涉到了河南戰場，在鄭州、陳留、杞縣也打了幾仗，雖有戰績，但無力挽回西北軍全盤皆輸的局面。仗打敗了，他認為軍人最要緊的是「忠誠」，對下屬說：「此時你們可以走，我張自忠做為一個軍人不會做背叛的行動。」全師除第十七旅出走外，尚有第十五旅、十六旅和手槍團，約5千人，他們聽了將軍的話，跟隨將軍過了黃河進入山西，是西北軍殘部中最完整的一支隊伍。他們與同時退

入山西的西北軍殘部會合，這批人中有宋哲元、劉汝明、魏鳳樓、過之綱、馮治安等統稱為「西北軍的死硬派」，他們決定不再作戰，通電靜候中央集中處置。中央令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負責整編這支隊伍，張學良即召宋哲元及將軍等人會商後，決定將這些軍人改編為東北軍第三軍。

1931年1月16日，張學良公布了東北軍第三軍的建制，宋哲元為軍長，下轄二個師，由馮治安和張自忠將軍分別任師長。6月，中央統一全國陸軍編制和番號，東北軍第三軍的番號改為陸軍第二十九軍，軍長仍是宋哲元，下屬的兩個師為三十七師，師長是馮治安，將軍任三十八師師長。

二十九軍正式成立的三個月後，爆發了「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佔領我東北地區，國難當頭，這支以愛國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軍隊，自覺的投入了全國抗日的洪流中，誠心的摒棄前嫌，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做成了幾件大事，在歷史上、在全國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泯滅的英名。

二十九軍初駐晉南，後駐冀南，1932年8月17日，政府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政府主席，二十九軍遂移駐察哈爾。1933年初，日軍進犯長城，宋受命

為第三軍團總指揮，率部趕赴喜峰口應戰，打了一個大勝仗，這就是當時全國振奮的喜峰口大捷。將軍在三屯營前線指揮戰鬥，他的功績是「殲敵步兵兩聯隊、騎兵一大隊」。這是將軍與侵略我國的日軍搏戰之始。長城戰役結束後，將軍率部回駐察哈爾，國民政府為獎勵將軍的戰功，1935年7月17日，為他頒授青天白日勳章。

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為平津衛戍司令。二十九軍是在中國的一個非常時期，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地點，從各方面說都是生長在夾縫中的一支軍事力量。這個位置得來實在不易，這種形勢下，在二十九軍中造成了如桃園三結義的緊密團結的宋、張、馮三人核心，他們齊心協力，兢兢業業的擔任了保衛華北的重任。這時三十七師馮治安部奉令移防平津，將軍的第三十八師遂成為察省維持治安的主要力量。11月8日，政府應宋哲元的請求，將察哈爾省主席秦德純調為北平市市長，並任命蕭振瀛為察哈爾省主席，在蕭未到任前由將軍代理。事實上蕭從未到職。12月11日，中央決定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將軍等17人為委員，於12月12日正式任命將軍為察哈爾省省主席，這是他首任封疆之職。

他就任察省主席後，首次面臨的難題乃是日本對察北的侵略，依據「秦土協議」，二十九軍要撤出察北地區，另由察哈爾省政府組織保安隊駐守，但日本駐張家口的特務機關長松井原太郎不以此為滿足，另與張北警備司令張允榮訂了所謂「張松協定」，允許偽蒙保安隊亦進駐察北六縣（沽原、康保、張北、寶昌、德化、商都）。將軍在任時否認「張松協定」的合法性，日本關東軍駐多倫機關部遂決定掩護偽蒙軍李守信、卓什海等部於12月中旬進佔六縣，且一度向張家口大境門進擊，為將軍所部三十八師擊退，隨與松井交涉，松井蠻不講理，乃報請冀察政務委員會向日本關東軍交涉，但也沒有結果。

1936年1月，日本政府制定了「處理華北綱要」，其核心是「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二省及平津兩市的自治」，5月，日本向駐華北中國駐屯軍大量增兵。二十九軍決定採取強硬態度以維護冀察主權，6月，宋哲元呈請中央明令調將軍代蕭振瀛為天津特別市市長，而由劉汝明接任察省主席，隨即任馮治安為河北省省主席，當年的華北，特別是天津在「九一八」事變後，實際上已是國防的前線。當年日本向內地實行軍事進攻的時機尚不成熟，於是她費盡心

機，把她心目中的二十九軍想像為「二國三邊」的第三邊，想用政治手段把平、津、冀、察佔領到手，國人則擔心冀察會成為第二個東北，所以冀察當時是最敏感的地區。天津市駐有十九國領事館，還有租界和五個國家的駐軍，其中駐軍最多的是日本達一萬多人。將軍擔任天津特別市市長，實際上是在做外事工作，尤其是必須與日人不斷折衝，加上當年南京中央政府內部複雜，辦事極難。此後的一年多時間是將軍一生中處境最困難的一年，是他內心最痛苦的一年，也是一生中為國家做出的又一重大貢獻的一年。但使將軍最痛苦的是，國人因不知真情的不諒解，他說：「心裡苦的很。」

將軍任師長的三十八師奉令東調，衛戍天津及塘沽到廊房一帶，因「辛丑和約」規定，天津市區只許列強駐兵，為此將軍首先在市區建成了配有裝甲車、機槍摩托車等有3千人的市保安隊，將三十八師特務營調到市內，警衛市政府，將駐在郊區的一一四旅配有卡車，每個戰士配給軍服、員警制服、保安隊服各一套，以備不時之需。班長以上每人發便裝一套，輪流去市內、租界內熟悉地形。

1936年6月18日，將軍接下了市財

政虧空、市政府官員、職員紀律渙散且貪污成風、市區治安不靖、塘沽口岸走私嚴重的爛攤子，將軍對此不只是沒有敷衍對待，他把這次對他的任命當做有了一次為百姓做些事的機會。於是他第二天一早即勤懇視政，首先帶頭樹立廉政之風，回絕一位要求承包天津稅務的商人，他向將軍保證讓將軍每年拿到25萬元的回扣，將軍不為所動，調二十九軍內的財務人員掌管全市的財政、稅務。將軍多次懇請一些為人正派且精通金融的專業人員來天津市工作，如全力挽留徐柏園等人、從三十八師調來官兵充實公安局、剷除局內的陋習，全市治安好轉，這一年天津經濟結束了長達十年的蕭條局面，首次出現經濟增長。將軍在這一年中，在吏治改革、教育、衛生、振災、戒毒、提倡新風氣等方面做了不少切實對天津百姓有利的事。報載11月天津財政剛剛好轉即向私立南開中學撥款1萬元，但是在當年他也處理了些不得不向日方低頭的事，引起輿論的不滿與批評。

1937年初，日方主動出資邀請宋哲元訪日。日本人為什麼要花這麼一筆大錢呢？原因是時任北平日本特務機關部輔佐官寺平忠輔所說的：「……乃是彼等所設計的：使宋哲元逃不出我們的掌

握的謀略之一。」此事幾經研究，報請中央批准後，由將軍出面於4月23日率領由二十九軍上層軍官組成的「冀察平津國外旅行團」赴日考察，此次行程，將軍小心到從未一人獨自與日人接觸。在出訪前《中央週報》上刊出「天津來信」一文，顛倒事實，挑撥造謠，待代表團回國後的5月2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駐北平的特派員程錫庚（伯昂）親自給外交部情報司發了一封未說明來源的密電，說將軍此次出訪日本，私下做了賣國的事，以程當時的身分來製造這種謠言，今天人人知其目的和背景。

到了抗戰勝利的二十多年後，有專人對將軍這次出訪日本經過做了複查，他們除了遍查了中方的檔案材料，還去了日本，查了日方的全部檔案，做出的結論是：「張自忠於26（1937）年4、5月間之赴日考察，是在並非心甘情愿的情形下，奉宋哲元之命去執行一項矛盾而困難的任務，……所幸張自忠去了日本，卻未嘗受制於狡黠的日本人，他自己忍受了誹謗，卻沒有做出對不起國家民族和同胞同志的事。」調查結論大快人心。

1937年7月16日，軍政部次長熊斌來到華北調查二十九軍情況，他自己從南京到了保定，派了一個處長去北平跑

了一趟。據此，在盧溝橋事件第十六次會議上做了報告，其中說到：「張自忠自赴日本以來，似害有二種病，即（1）因日人給以許多新式武器之參觀，以致畏日；（2）因日人對其優待而親日……。」這樣恐日、親日的主和派的帽子就正正當當的壓在將軍的頭上了，駐北平辦事處的某官員更有「張、石等部有參加日軍行動」的密電發給中央，雖然有這些不實的報告當年確實送到了，由於將軍的人品深為人知，這些並未動搖各級領導人對他的信任。將軍對這些誣衊，陷害自己的事，從未做過一句自我辯解。

為要說清上面這二件事，要說說程錫庚和熊斌二個人後來的事。一個是程錫庚，因為在七七事變後，就被日人任命為「偽聯合準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於1938年4月9日被「天津抗日殺奸團」打死在天津大光明電影院，是他漢奸的自白，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將軍的光明磊落；另一個是以訪日事為由，首次將「主和派」帽子套給將軍的熊斌，他在1940年寫的悼詩中有「盧溝玉碎昆岡焚，和戰利害本平分」，這句詩的意思是說：當年我說你是主和派，並非說你是戰略上的主和派，而是戰術上（是否要在平津和日本打一仗）的主和派。熊斌的這些話在七七事變後不久即向將軍

有過解釋。張將軍對傷害過他而認錯了的人，從來是原諒的。

在宋哲元將軍的領導下，二十九軍在冀察時期，兵力擴大到10萬人，共有完整的四十八個團。在裝備上士兵都用了槍，把大刀那樣的落後裝備全部替換下來，將軍對二十九軍的壯大也做出貢獻。賀耀祖將軍記錄了1936年在天津，當他告訴將軍，中央發給二十九軍購買中小口徑炮和機槍的進口護照時，將軍又唱又打拳快樂的樣子。賀將軍寫道：當時我自言自語「燕趙之事，慷慨悲歌，就是這樣的氣概吧！」賀將軍呀！若是你見到前年在喜峰口前線，在有飛機、坦克、機槍、大炮的日本兵前，將軍是怎樣咬斷牙根，向手拿大刀的戰士下達夜襲衝鋒令的情景，你一定能理解，將軍得到「進口護照」時手舞足蹈的心情了。

這時三十八師有五個旅，計3萬人，這批武器裝備在1937年的天津和1938年4月的臨沂戰場上，為打敗日軍，曾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三

1937年7月7日晚，七七事變爆發，當天宋哲元將軍在樂陵，馮治安將軍在保定，將軍因患痢疾，在北平府右街家中養病。據記載七七後日軍立即破壞了

北平到樂陵和保定的電話線，當年通訊設備原本極差，且保密性能幾乎沒有，所以當七七事變後，中央及宋哲元將軍的原則指示、具體行動都應按宋哲元離平時的安排，由張、馮、秦三人決斷、實施，在軍事上如在宛平縣，吉星文團打響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第一槍；及8日夜到9日晨，及10日對日反擊；三次用兵，分寸十分準確，秦德純9日與日方達成的口頭「停戰協定」獲中央獎勵，接著9、10兩天對日談判「停戰協議」。這麼一些大事，在事變後的前五天，能有條不紊處理，應歸功於二十九軍內部的有序和三人的團結。

據日方記載，張自忠將軍於10日夜，秦德純於11日晨5時按中央的指示，拒絕了日方在停戰協議中要中方立即撤出宛平城的無理要求，日方預測在平將還有一戰。由於此時日軍主力還未到北平，為此，11日上午，日方請了林耕宇、齊燮元、孫潤宇、張允榮等四人商訂新的停戰協議條款，隨後通過張允榮提出了該「讓步」方案。

11日下午6時宋哲元回到天津主持工作，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看到了張允榮送來的那份停戰協議草稿（日方稱之為「七七事變戰地協議」），他認為這是一個「內容均甚空洞的三條協議」，立

即決定由將軍和張允榮二人代表二十九軍在北平與日方辦了簽字手續，該協議7月22日向中央補報，獲准。

14日將軍由平赴津，午時（11-13時），宋哲元向中央發出密電，要求改變二十九軍駐防性質，要求集結兵力，並請求撤出天津。戌時（19-21時），收到回電，中央未批准此方案。

據日方記載，14日宋哲元原則上同意了專田少佐向他提出的「七項目」，並派張自忠等人當晚在天津與日方談判，談判內容還包括二十九軍向日方道歉的人選、方式、處罰二十九軍人員等無理要求，將軍等人和日方幾次談判，妥當處理了這些問題。19日上午宋哲元回到北平，當晚將軍和張允榮二人奉命代表二十九軍在天津與日方簽署了「細則」，即日方說的「停戰協定的第三條誓（約）文」，據日方記載，20日晨5時宋哲元在平依「細則」條約，發出三十七師撤出北平城的命令。

23日，為了防止日方挑起事端，將軍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具名文章，說：「……刻以宋委員長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員長在平處理，……。」

25日，日軍乘一列車進駐廊坊，劉振三旅向日軍交涉，日軍不退，發生激戰。

26日，日軍分別在北平附近多處挑釁。二十九軍向南京政府一天之內發了幾個密電，報告戰況，電文最後有「速示機宜」幾字。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申時（15-17時）批示：「此時先應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為基礎，切勿使之疏失，……。」於戌時（19-21時）發出「從速部署決心大戰電」。

27日，二十九軍又向中央發出「呈請速派大軍北進及飛機電」等六份彙報戰況的密電，蔣委員長批示仍然是要求二十九軍固守北平，並於上午10時給宋哲元發電報，仍要求固守北平等地，夜10時又給宋哲元將軍發出一封口氣更強硬的密電：「請兄靜鎮謹守，穩打三日……，務望嚴令各部，加深壕溝，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宋哲元將軍復電：「……現已四面皆敵，職受國家人民付託之重，已決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振士氣，決不敢少有畏避。」

與此同時，蔣委員長下達的還有令宋哲元將軍本人赴保定指揮的命令。

28日，日軍包圍北平，兵力有陸軍一個師團和三個旅團，還有空軍等機械化部隊，二十九軍在南苑戰場上的副軍長佟麟閣，和一二三師趙登禹師長英勇戰死，戰事對我不利。宋哲元將軍主

持開會，決定二十九軍撤出北平，宋、張、馮三人雖然明知為避免包圍被迫決戰計，此時二十九軍的撤出是必須的，但幾小時前中央下了要二十九軍死守北平三日的軍令，此時未經中央批准的撤兵是件違令的大事，但情況緊急，已沒有請示中央的時間了。二十九軍要考慮事後如何向中央解釋，同時為大軍撤退爭取時間。再者，二十九軍是一個很負責的部隊，為了埋葬烈士、救治傷員，為了軍隊撤退後北平市市面的秩序，為了安置未能跟隨撤退的二十九軍的文職人員及眷屬等事宜，二十九軍必須有領導人留下辦理這些要事。

據秦德純將軍記下，宋哲元將軍曾和他商議過兩個方案，一個是令他帶四個團留守北平，一個是令張自忠將軍率二個旅，留守北平。最後決定由張自忠將軍冒險留平十日。他名義上被宋哲元將軍任命為「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冀察綏靖代主任」、「北平市代理市長」等職，但這麼處理非常突然，甚至當時在張家口的劉汝明說當聽到此事時：「晴天霹靂，使我大為困惑，……，後來當宋先生向他說明了情況他才知，張自忠將軍是以跳火坑的精神留平的。」可見當年劉汝明將軍也不知情。

將軍留平時面對著很多難題，其中特別嚴重的二個難題是：（一）留下，要擔當失城之責的大罪，大家都記得十年前的「馬邑」事件，使他幾乎喪命的教訓；（二）隻身留平如何避開日軍的迫害？及如何逃出北平？當年將軍的想法已無記載，今天從他的實際行動看到，對前者，他堅信宋、馮、秦事後為他的解說和申訴，會使他解脫此項罪責；而後者他相信中方的地方勢力和英美在平津的朋友，有足夠的力量助他逃生。雖然如此，此事風險之大，是對他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心的又一次考驗。今天看到，這二個天大的難題，的確是如願解決了。為此蔣委員長對張自忠將軍在此時期的行為的評價是：「夫見危授命，烈士之行，古今猶多有之，至於當艱難之會，內斷諸心，苟利國家，曾不以當世之是非毀譽亂其慮，此古大臣謀國之用心，固非尋常之人所及知，亦非尋常之人所能任也。」

28日下午，將軍送走宋哲元等人去保定後，電令在天津的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率部向天津日軍發起進攻。李文田接令後發布了作戰令，29日凌晨2時天津部隊全線向日軍進攻，戰果不小，30日，因無後援，三十八師撤出天津，將軍本人則在北平含淚埋葬了幾天中戰死的將士遺

體，安置好傷員，組織二十九軍家屬及有關人員轉移、隱蔽，給他們發送錢款、糧食（當年二十九軍副參謀長也是將軍第二天才向他傳達撤退資訊的）。8月1日，平、保聯繫斷絕，日軍開始進城，當晚8時，二十七旅受將軍的命令突圍，走在前面的二千餘人突出了重圍到達察哈爾，殿後的一千餘人被日軍擊潰，跟隨在隊後的石旅長被沖散，將軍隨隊撤出北平的計畫，也未能實現。此後多次設法逃出北平，均未果，北京陷，日軍下令捉拿他，將軍一日三遷，在英、美、德友人處得到庇護。

8月6日，將軍在留平的第十天，按計畫登報辭去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職。

9月3日將軍在英、美在平津力量的幫助下，化裝逃出北平，經天津到達山東。宋哲元派秦德純、石敬亭陪同將軍赴南京，向中央彙報留平經過，但10月8日軍事委員會曾發出一個命令說：「天津市長兼陸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張自忠放棄責任，迭失守地，……，撤職查辦，……。」該命令說的是，要將軍一人為二十九軍失守北平、天津兩地負責，就在公布該處分的同時，將軍到了南京，由秦德純先生向中央遞交了「冀察綏靖主任宋哲元呈蔣委員長為代主任

張自忠離平歸來報告」，這個報告概括而全面的彙報了將軍的留平經過。

10月9日蔣委員長接見了將軍，詳細的聽取了他的彙報。三天後，於12日再次召見，令將軍暫在南京稍事休養，恢復健康後再返部隊，說明了經過這三天中央的審查後，中央認為張自忠將軍在平津並未做過什麼錯事。

10月末將軍被任命為軍政部中將部副，將軍一生中遇到的第二次失城冤案，就此得到澄清。

年底中央政府機關向武漢轉移，火車行至鄭州，宋哲元令第一集團軍駐鄭州辦事處主任傅正舜赴車站，接將軍去新鄉李元屯第一集團軍司令部一晤，隨即宋哲元請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向蔣委員長轉呈了懇請准許將軍代理五十九軍軍長的報告，獲准，於是將軍以軍政部中將部副的身分代理五十九軍軍長，開始了他的另一個輝煌、璀璨、壯懷激烈的年代。

四

1938年1月五十九軍劃歸五戰區節制。

2月11日，中央明令任命將軍為五十九軍軍長，率部應援淝水于學忠部，他打退了日軍，收回失地，首獲捷報。

3月奉令參加臨沂保衛戰，五十九軍

於3月11日下午自嶧縣直撲臨沂，於12日下午在臨沂西郊集結完畢，其主力部隊計一日夜步行軍180里，與號稱鐵軍的坂垣師團（第五師團）激戰七晝夜，殲敵過半，打敗日軍，迫使坂垣師團後退70里，被稱為台兒莊之戰的序幕，是因為坂垣師團（第五師團）是日軍用於進攻台兒莊的二個師團之一，在臨沂被擋住，使他的第十師團只得孤軍向台兒莊進攻，此舉為台兒莊的大勝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蔣委員長的評價是「而臨沂之役，蓋忱率所部疾趨戰地，一日夜達百八十里，與敵坂垣師團號稱鐵軍者鏖戰七晝夜，卒殲敵師，是為我抗戰以來克敵制勝之始。」

這個戰役不只是軍事上的勝利，更加重要的是，這次勝利是沒有飛機坦克，僅使用落後武器的中國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戰勝了裝備先進的日軍。這個事實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日勝利的信心，這也是一次精神上的重大勝利，意義很重，震驚中外。

臨沂戰役戰鬥異常激烈，我們的付出也是重大的，五十九軍在日傷亡軍官四十人、士兵近千人的七天，張自忠將軍多次到營、連指揮部瞭解戰況，鼓勵士氣，撤換了作戰不利的旅長，全軍此

役雖傷亡近半，開戰時的連長幾乎全部傷亡了，但士氣一直大振。

3月30日，軍委會以「張自忠臨沂戰役中樹建奇功」的理由，撤銷了那個「撤職查辦」處分。

4月13日將軍晉升為二十七軍團軍團長，轄五十九軍及九十二軍，二十七軍團被列為徐州戰役撤退時的斷後軍團，將軍令五十九軍殿後，並將全軍車馬供傷員使用，而將軍則親率手槍隊，徒步走在五十九軍的最後。

武漢會戰開始，將軍率部於大別山北路與日軍作戰。9月7日首戰於春和鋪，三十八師黃維綱師長、李九思旅長迭挫強敵受嘉獎，隨即奉令進駐潢川。16日，日軍圍城，將軍率五十九軍一八〇師，孤軍守城十二日。日寇進攻不下，使用毒氣，但未能越雷池，一八〇師劉振三師長、張宗衡旅長在潢川，光山之役受嘉獎，此後在經扶、陳塘、高山及鄂東轉進等戰役均有戰績。

10月13日將軍晉升為陸軍上將銜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

11月13日將軍奉命赴荊門接受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又稱右集團軍）總司令的職務，率部隊守衛襄江，司令部設在襄江西岸的荊門。

自11月到次（1939）年4月與日軍在京山、鍾祥一帶有過四次戰鬥。京鍾戰役中，2月28日將軍第一次率部過江督戰，收復了失地，殲敵六千，獲國民政府獎勵。

1939年2月16日，國民政府向將軍頒授寶鼎勳章。

4月末，隨棗會戰開始，29日日軍向右翼進攻，5月8日將軍第二次渡江，組織右集團軍的第二十九集團軍、五十五軍、五十九軍、七十七軍大敗日軍，會戰於5月下旬結束，右集團軍殲敵四千，即鄂北之捷。

8月上旬奉召赴渝述職。

1939年12月12日，據全國統一部署，將軍向右翼兵團下達對日軍發起「冬季攻勢」令，12月20日將軍第三次渡江督戰，此役到2月中旬結束，右翼兵團殲敵萬餘人，受中央嘉獎，此後一段時期前方平靜。

1940年1月「華北視察慰勞團」去前線慰問，成員中的梁實秋先生在回憶錄中對將軍的生活情況有下列評論：「高級將領之能刻苦自律，如張自忠將軍者，實不多見。」將軍在1940年4月1日的一封信中寫了「近來雖困苦點，但精神上我確十二分慰快。」

五

1940年4月日本陸相向十一軍下達了發動「宜昌作戰」令。中方稱之為「棗宜會戰」。日軍的作戰方針是「……首先（第一期）將敵軍第五戰區兵團主力，擊滅於連接隨縣、襄陽之線以北地區，繼而（第二期）將漢水右岸敵軍，壓迫於宜昌附近予以殲滅之。」說明白了日軍這次的行動核心就是先打擊五戰區的實力，其重點在打擊右翼，再渡過由右翼守衛的襄河，達到進攻宜昌的目的。

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將軍病逝在綿陽，張自忠將軍赴綿陽悼祭，隨後直赴老河口參加4月13日及14日五戰區召開的軍事會議。

該次會議開會時，正當周至柔將軍上報，空軍12日截獲的日方情報「日方近日要進攻宜昌」，故這次會議對日軍是否進攻宜昌應是討論的重點，接著於14日、17日，李宗仁和戴笠上報了二份情報，均稱此役日方的進攻目標為襄樊，主攻桐柏、大洪山，不打右翼，不攻宜昌。今天看來這是二份假情報，但日方做得很認真。

五戰區於該軍事會後報送作戰計畫，獲中央批准，該計畫寫著「於棗陽以東，荊門、當陽以南地區與敵決戰」，即此戰可能和日決戰地有二個，一個在河東的棗陽以東地區，一個是在河西的荊門、當陽以南，可知會上有日軍此役是進攻棗陽，和進攻宜昌的二種觀點。未得統一，一併寫上。

眾所周知該戰役開戰半月後的5月16日張自忠將軍率領的五個師被幾倍日軍包圍。在宜城縣襄河東岸，為守衛襄河他盡了最大的努力。5月31日襄河失守，日軍在歐家廟渡過襄河到了西岸。6月12日宜昌陷落。17日戰役結束。

張秉均先生多年後對該戰役的評述中說：「尤以張自忠總司令親率一師獨遇強敵，痛折名將，遂失名城，該方面指揮錯亂，協同不良，昭然若揭。」正如1940年任中央社駐湖北記者組組長的徐怨宇先生，在1985年的宜城會上所說的：「張自忠將軍殉國之原因，與五戰區指揮錯誤有關。」

他們指的戰區犯下的重大錯誤，應是認為日軍此役不進攻宜昌。¹

1 其一根據是在兵力布局上戰區多次抽調保衛襄河的右翼兵團的兵力去棗陽一帶，而在河東地區到了5月中旬只保留了極少的兵力，不只是沒有在該地區與敵決戰的準備，反而留給日軍一個渡過襄河攻打宜昌的空檔。再有當日軍10日以後轉向攻渡襄河攻打宜昌時，戰區卻根本沒有意識到日軍的目的，反而認為是日軍戰敗的撤退，急向中央報捷。第三是蘇聯總顧問福爾根1940年7月11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論及此役戰敗的基本原因時，第一條是「誤信敵不佔宜昌之說」。

5月1日，日十一軍隨派出三個師團和二個旅團約10萬人，從南北二向分三路開始了進攻，此後幾天南路日軍天天動用了一百多架次的飛機，和大量的坦克、大炮向長壽店以南的一三二師和一七九師及長壽店東南的一八〇師和騎九師發起了大規模的攻擊，3日長壽店、田家集失守。日軍又向三十八師進攻，甚至於6日對三十八師三次使用了毒氣。6日豐樂張家集失守。

據黃琪翔說，此役初期右翼首先被突破，並有幾個師受損的「客觀的原因」是「以寡敵眾」的結果。²

5月8日「第三十一集團軍司令湯恩伯呈鄂敵行動特點電」中寫到「敵軍較前相異特點」時說「（敵）避免與我決戰，乘虛鑽隙，我擊其尾則留後衛抵抗，大隊依然前進；我襲其側，留側位抵抗，大隊依然前進」，這時他位於棗陽的東北。湯恩伯在北線報告想和日軍作戰，但日軍迴避：

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呈鄂敵行動特點電（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鄂敵進犯時行動之特點

此次侵犯唐、桐、泌一帶之敵，其兵力最大限為一個師團，其行動較前相異特點：

（一）輕裝行動，秘密迅速，多夜間行動，道路異常熟悉。

（二）避免與我決戰，乘虛鑽隙，我擊其尾則留後衛抵抗，大隊依然前進；我襲其側，則側衛抵抗，大隊依然前進。

（三）敵配屬騎兵甚多，搜索範圍甚廣，避免我主力行動，對民眾少殘殺。

（四）因敵行動秘密迅速，避免與我決戰，職部日夜奔波，尚未遇一決戰機會，今後是否可用少數兵力多佔據點，制止敵之流竄，主力分進襲擊。

（錄自總統府機要檔案）

日軍在南路重打，北路不打的事實並未令戰區覺醒。

就在右翼兵團受到嚴重的打擊時，5月6日戰區下令解除右翼兵團對二十九集團軍（四個師）的指揮權。明令三十三

2 黃琪翔在四十年代寫的「悼張蓋忱上將」中寫到：「現在我要談起豫南鄂北會戰中的蓋忱兄，與我今年5月初旬會戰開始，我奉命擔任正面，指揮作戰蓋忱兄是指揮右翼的。會戰展開，右翼防線首先被敵人突破，一時給全線戰局以不良的影響。當我得到戰鬥失利的消息，一時使我對他的認識，又重複起了懷疑，為什麼戰鬥力會這樣的脆弱呢？不自覺的發出這句問話來，後來得到正確的情報，才知道敵人進攻右翼，是有著凶毒的計畫，和優勢的兵力，而蓋忱兄，以寡敵眾，失敗是有著他客觀的原因。然而這一次戰鬥的經過已予敵人不少的打擊，在蓋忱兄可說是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集團軍副總司令周晷帶領七十五軍和三十九軍先向快活鋪、宜城間前進，歸戰區直轄。這是五戰區在該戰役中再次下的，減弱右翼兵團兵力的命令。

5月6日將軍留下給馮治安的信，毅然隨著正在窯灣過江的七十四師「順勢過江」了，信很短：

仰之我弟如晤：因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拚，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三十八師、一七九師取得連（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拚。設若與一七九師、三十八師取不上連（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專此布達

小兄張自忠手啟

五.六.於快活鋪

該信雖短，但很清楚的說明了三個問題：

（一）信中明確說明了右翼兵團當前的兩個任務：即「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係」和「本身之責任」。前者說要

參加五戰區在棗陽附近與日軍決戰的計畫，後者說的是右翼兵團擔任著防守襄河的任務。

為什麼二個任務都要北進完成呢？因為根據實際情況，將軍此時心裡很明白，據他現在擁有的兵力，是無力守住襄河的，現在要守住襄河，只能寄希望於棗陽重創日軍，使日軍無力渡河，才可能完成守河任務。這是他急於親自過江的第一個原因吧！也是他第四次東渡襄河督戰。

（二）信中也說清了5月6日時右翼兵團的兵力情況：

當時右翼兵團轄有十二個師，已派向河東的有三十三集團軍的六個師和二十九集團軍的四個師。河西僅有三十七師和七十四師。這時七十四師正在窯灣渡河，已過去了一個團。還有二個團正在渡河。將軍帶著特務營就勢隨他們在一個「大風傍晚，黃沙蔽天」的黃昏過河了。

說到這裡，有人會問，當年河東原有三十三集團軍的六個師，為什麼信中只提到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呢？原因是明確的，在開戰以來的幾天裡，那四個師受到日軍重點打擊，實力已消耗的不輕，情況不明。

從信中還可看到，當時不只是認

為四個師可能已被打散，還存在著過江後，可能和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聯絡不上的結果，說明了當時江東的軍情十分嚴峻。

為了弄清實情，為了盡快、盡多的收攏被日軍打散了的隊伍，使他們盡快的恢復戰鬥力，為了找到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挽回損失，這些也是將軍此次下決心親自過江的第二個原因吧！

（三）從信上看到，這次渡江的第三個原因是將軍許下的一個心願「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

這裡作的好壞應是過江後集中多少兵力，打多少勝仗和守住襄河這兩件事吧。看將軍信中對做成這二件事均無把握。只能說：若一個師也無法集中，也要帶著七十四師才過江的三團人向北衝向火線。表達他對祖國、對民族的忠義之志。

將軍是極內斂，說話極慎重的人，從他能說出這句話，可看出他此時心情不太平靜。將軍一生對個人的委屈從不辯解、不上告、不訴苦、更不埋怨，而是深深的藏在自己心裡，此時他不單是沉默，而是不顧個人生命的安危，去做認為現時還能做到的、能補救大局、減少損失的事，以求良心安慰。

將軍過江後，在兵力如此困難的時期，把二十九集團軍的四個師交還給了戰區。9日三十八師與總部匯合。這時江東的一七九師、一八〇師、騎九師和七十四師剩餘的兵力也全部集合起來，形成一支很有實力的隊伍。全力向北，在梅家高廟和敵人打了一個勝仗。

將軍心中想的在棗陽與敵決戰的願望沒能實現，當他到達主戰場前，5月8日日本第十一軍決定開始他們的橫渡漢水，攻佔宜昌的第二階段作戰計畫。

5月10日，日軍發布「呂集作戰甲第六四六號命令」，不顧第三師團被五戰區的二十多個師層層包圍，令第十三師團、第三十九師團和池田支隊向張自忠將軍率領的守衛襄河的五個師進攻。

但五戰區於5月11日卻向中央報告「分路進犯之敵，經我各部痛擊，已全線退卻」，相信該戰役已取得勝利。

5月12日，將軍接到五戰區的命令。有關的是「向南截擊五千回竄鍾祥的日軍。右翼要置主力於洋梓以北；七十七軍向洋梓，鍾祥攻擊；五十五軍要攻佔鍾祥」，即分路向南截擊日軍命令。13日將軍真實調整了兵力，離開主戰場，從現駐地峪山和黃龍壩，分為左縱隊和右縱隊二路向南截擊日軍，實際進入了

日軍的包圍圈。³

當將軍發覺被敵包圍情況嚴重時，相隔七公里的左、右縱隊被日軍分隔擋住。張自忠將軍率領的右縱隊為騎九師和七十四師和總部特務營。14日的方家集一戰非常激烈，騎九師損失嚴重。

《抗日戰史》上說「當時如通信連絡靈活，其他兵力抽兵往援，戰果或可改觀」，甚至日本史書上也有記述，確實就在近處就屯有可派而沒派來的援軍。但事後戰區總結上說「5月13日至15日，張故總司令在南瓜店東北罐子口附近時，有線電報電話均不能通，……僅賴無線通信，因之不能得知該方面戰況」。

蔣委員長對將軍殉國的經過是這樣寫的：「今茲隨棗之役敵悉其全力三路來攻，蓋枕在棗陽之方家集，獨當正面，斷其歸路，斃敵無算，我軍大捷，假蓋枕不死，則此役收效當不止於此。」蔣委員長此話中說到了二個問題：第一個是他說出了當年五戰區的兵力有五十七個師（日方統計為五十一個師）卻指揮成用張自忠將軍五個師去獨當十萬進攻日軍的三分之二的實情；第

二個他說當時若派給足夠的軍隊或援軍就好了，那麼張自忠將軍不會戰死，日軍就過不了漢江，宜昌就不會失守了。

雖然多方報導，由於日軍對中方通訊聯絡的破壞，但今天仍看到二檔館留下的將軍在這幾天裡向中央報告戰況的幾份電報。5月14日，將軍報告把自己的衛隊、總部指揮人員都動員起來和日本人做最後的戰鬥。15日又報親率總部特務營與敵血戰竟日，不知戰區是否也收到此電，也不知中央如何處理將軍的這些急電？因為就在將軍殉國的那天，蔣先生卻還在批示：「英國武官要求前往第五戰區參觀此次作戰成績，可准其參觀。」看來他當時並未見到張自忠將軍這些戰況的電報，這一件件失誤的後果都壓在將軍的身上了。

14日將軍已發現情況危急，即命右縱隊的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攻佔新街，而自己帶左縱隊趁天黑銜枚向四通八達依山傍水的南瓜店前進，希望在那一帶求得轉機，有人回憶將軍此時還曾向黃琪翔商借兵力的事。未見實據。但黃琪翔在悼文上說曾討論過要出兵協助右翼的事。

3 在《抗日戰史》上對這一軍事行動評為「此時，我各級指揮官敵情判斷錯誤，誤認敵軍退卻，忽視其運用內線作戰各個擊破我軍之企圖，遂以呂堰、雙溝南窺之敵系奪路而逃。因此，導致三十三集團軍孤軍深入，被敵各個擊破，相繼陷棗陽反包圍戰於不利」。「三十三集團軍的孤軍躁進」及「三十三集團軍的孤軍深入，被敵各個擊破」。而這個「孤軍躁進」或「孤軍深入」局面的形成，全是將軍忠實地執行五戰區的錯誤命令而造成的。

5月15日，左縱隊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一度佔領了相距羅家榨屋僅八公里的新街，這時日方大量增兵，迫使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退出新街，只能全力打退進攻的敵軍，再繞兩乳山向總部靠近。

5月16日上午，右縱隊與日軍爭奪與新街相通的羅家榨屋，「張自忠總司令親率特務營與敵反復衝殺，羅家榨屋失而復得數次」。

將軍看出了形勢的嚴峻，想到當日有可能與主力部隊匯合不上，於是決定送走二位蘇聯顧問，並命令司令部的受傷人員和非戰鬥人員撤退。

此時將軍身邊的兵力不多，但仍在和日軍戰鬥的右縱隊有七十四師，左縱隊有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腳下的南瓜店雖小，但這是守衛著身後襄河的最後防線。為了保衛襄河，為穩定戰局等待轉機，將軍受傷不退，和將士一起，和人數多於自己幾倍的日軍拚戰到底。

張敬是很年輕的少將高參，屬於應撤退的文職人員，在這極困難的時候他卻堅決不退，一直留在將軍身邊，最後和將軍一起英勇戰死在南瓜店。

1940年5月16日中午，張自忠將軍左臂受傷，約14時「身受七傷，腹為之穿」，英勇殉國於湖北宜城十里長山下的南瓜店。

將軍為了完成守河任務，做到了他多次下達過的「要堅持最後一秒鐘」的命令，但他未能見到從身後遲來的三十八師和一七九師的援軍，更沒能見到抗戰勝利的日子。

但是我清楚知道的是，在1945年8月11日的凌晨，從重慶電臺聽到日本乞降資訊那一天正是張自忠將軍的誕辰日。

六

日軍初葬將軍於襄陽陳家集。⁴

1940年5月19日在鍾祥快活鋪，以

4 1985年我去宜城時，曾去襄陽縣陳家集，當年那裡是日軍的師團指揮部，爺爺殉國後遺體由南瓜店被送到這裡，由曾在北平時代見過他的日方軍官確認後，初葬於陳家集的陳家祠堂後。據說日方曾立一木牌，後來在那裡發現一塊小石碑，刻有「張上將軍初葬處」，該碑除這幾個字外，只有用阿拉伯文寫的日期「1940.5.16」，沒有落款。該石碑是在修造糧庫時挖出的，據王心角生前說石碑是三十八師在當年5月底送來，埋在原地的。在陳家集我見到尚禮堂老人，那年他是七十一歲，算了一下，四十五年前他是十六歲，他對我講，那年他隨父母躲避日軍，從山上見日軍撤走，回家後，在房後發現甦醒過來的馬孝堂副官，是他找到王心角、王心富把馬副官抬到祠堂裡，他聽到馬副官和他們的談話，還記得饅馬副官米湯事，後由王家兄弟、周洪法等四人把馬副官抬送去三十八師師部。他說三十八師給他們很多錢，他們只要了頭牛錢，第二天由三十八師手槍隊來將遺體送往重慶。我去陳家集時，王家兄弟等四人皆已故去，尚禮堂老人眼睛已近失明，在那座糧庫旁，他給我們講，日人當年用民間棺材，頭向西北、淺葬棺木的情景。以上是我親自聽到和看到的。遺體17日夜送到襄河邊的王集，停在「明記三房」糧行的廂房，王儀章老人當年是明記三房的管帳先生，他當年見過此事。第二天一早在章家嘴，由當年的擺渡工章德宏送到對岸，在快活鋪換了上將裝，和楠木棺。

上將服重殮，換為金絲楠木的棺槨，於5月23日晨4時，從宜昌市東山草堂，以當地正式出殯的形式，將棺木抬到江邊民風輪上，百姓前來送葬，不期而集者傾城十萬，代省長嚴重、郭懌、蕭之楚等諸將軍著禮服送靈，軍樂隊前導，鞭炮齊鳴，敵機三次凌空無一人退祭，無指揮而整肅無比。

沿江大小碼頭飛幡迎祭，28日下午3時船到重慶儲奇門碼頭，軍事委員會正、副委員長蔣中正先生、馮玉祥先生等文武百官肅立於碼頭迎靈，船祭。

8月15日延安各界舉行追悼會。

11月16日權厝於重慶市北碚區雨臺山，該山隨改名為梅花山。

1940年7月7日國民政府同時發布追晉將軍為陸軍上將令和國民政府褒恤令。

12月將湖北宜城縣改名為自忠縣。

1946年6月5日國民政府頒發榮字第一號榮哀狀。

1947年國民政府在討論對全國八年抗戰期間逝世先人的紀念辦理時，張自忠將軍是以無記名投票決定，給予國家最高榮譽、國葬待遇的唯一一位軍人；1947年5月10日國民政府頒發國葬令，至於為什麼沒辦，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

至今臺灣有一座自忠山，上海、北京、天津、武漢等七處均有以將軍名字命名的馬路，有幾處中小學也以將軍名字命名。

1960年深葬將軍於原權厝地，文化大革命中將軍的墓地部分石料及「英烈千秋」碑丟失，墳墓及墓碑未遭損壞。

張自忠將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陣營五十餘同盟國中戰死沙場的最高將領，他是中華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

安息吧！將軍！世界各地、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兒女，沒有忘記你！